

BEI GUIXUN DE LISHI XIANGXIANG

詹 玲◎著

被规训的 历史想像：

论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LUN CHANGPIAN LISHIXIAOSHUO LIZIC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76

BEI GUIXUN DE LISHI XIANGXIANG

被规训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
历史想像：
论长篇历史小说

LUN CHANGPIAN LISHIXIAOSHU LIZICHENG

藏书章

《李自成》

詹玲◎著

I207.425
205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规训的历史想像: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詹玲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687-1

I. 被… II. 詹… III. 历史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860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被规训的历史想像: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詹玲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687-1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吴 秀 明

数千年璀璨的历史文明,印证了中华民族的古老与沧桑。与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相呼应,历史演义从来都是文学大家族中发达丰饶的一支,它形象地记录下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流向。行近二十世纪,伴随小说地位的迅速提高,历史小说作为历史演义的主要承继者,本应集其所成循时迭进,形成小说文类的重要一翼。然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历史小说并未如人们想象那样达到理想繁荣的境地。“五四”以降,鲁迅、郁达夫等尝试以新的历史观解释历史,《故事新编》、《采石矶》等短篇便是其中的优秀成果;三四十年代,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系列小说在结构、叙述方式上师承法国近代“大河小说”,气势宏阔,笔法精细。但若计较起来,它们倒是更像鲁迅所说的是“历史的小说”而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小说”。就其总体而言,不仅成就不高,而且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比也不免显得有些孱弱。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打倒孔家店”的精神教义所造成的反历史心态影响了人们写史述史的热情,恐怕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激烈的时代变动

和社会变革使大家难以静下心来搜史寻迹，他们的过于焦虑的心态在此时此刻不大适合于历史小说创作；再者是对历史的心存忌惮，抱持一份应有的敬畏之情，这也许是大多作家不敢也不愿涉足历史小说的又一个原因。尽管“五四”前后，文学几成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新思维的实验场，但一俟涉及到历史叙事，作家们普遍都比较谨慎，不敢太随意。

胡适认为，历史小说应“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而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①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典型的“五四”时的历史小说观。然而，既要保持对历史应有的敬畏，又能将个体独立的精神内涵注入历史本体，重构新时代下的新历史，在“循史”与“求新”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对刚开始历史小说新文体实验的作家来说又谈何容易！鲁迅可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故事新编》笔法荒诞，语调油滑，但寓意深刻，直剖底里，对待历史的态度严肃却不受拘缚。但鲁迅开拓的这条道路，却没有为大多数的后来者所续。“文学是人学”的新文学精神也没有在历史小说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即使在同为历史叙事的历史剧那里，其丰硕程度也在历史小说之上——这或许与戏剧本身所具有的超强的鼓动功效不无关系。历史剧的仪式感、现场感可有效地调动和激发群体的政治社会热情及参与意识。与历史小说相比，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似乎更直捷，效果也更明显。并且，由于与彼时社会现实和政治文化的紧密结合，它在新文学中一直处于主流或中心的位置。

^① 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上述种种,就构成了姚雪垠的《李自成》直接的和间接的创作背景。尽管这部超长篇的历史小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从文学史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重塑历史小说辉煌,恢复它应有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李自成》是做出贡献的。谈百年的中国现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无论如何,《李自成》是无法绕过的一个典型文本,一个巨大的存在。

不必讳言,《李自成》的历史政治化的色彩是很浓的。这也是这部先后历时半个世纪创作而成的历史长篇,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有关这方面批评文章很多,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妨也可以说,这种历史政治化是否也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先前历史叙事的格局,为其创作拓开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的阐释空间呢?在继《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历史演义之后,历史小说到《李自成》这里才重新接续并重构了与历史的“异质同构”关系。与成长于“五四”稍后的大多作家一样,姚雪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对古诗文有深厚的造诣,并有“五四”的经历且较早受到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这些都对《李自成》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描绘明宫精致之像时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古典气息,史诗体例和构架上嵌有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品的印记,以及对《子夜》的政治思维与社会分析的借鉴;至于受《三国演义》战争场景、英雄形象、传奇色彩方面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正是集前人之所长,才使《李自成》将历史政治化写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给其后的历史小说以深刻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历史小说一度景况空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优秀或较优秀之作,而且在首届及其后的历届茅盾文学奖(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中均占据相当比重,都与此密切相关。这一

时期出现的大多历史小说，像凌力的《星星草》、蒋和森的《风萧萧》、杨书案的《九月菊》、顾汶光等的《天国恨》等，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到文体形式、语言风格，都烙上明显的《李自成》的痕迹，有些地方甚至不无模仿。

与《李自成》上述创作相关而又不同的，是以往的评论研究不仅运用历史政治化的解读方式，而且也十分强调和突出以历史真实为本的理论主张。翻看当时不少有关《李自成》的评论和研究文章，它们彼此观点虽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的歧异，但在这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或一致之处：肯定者，就到历史真实那里寻找依据，反之亦然。这样的批评不仅简单粗糙，而且也不甚合乎《李自成》创作实际。它忽略了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艺术属性，有意无意地将历史小说降到了历史附庸的地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是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本体理论，历来探讨颇多，但占主导地位始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延至现代，这种思维理念仍有强大的惯性力。不少评论研究文章，往往名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或统一），似乎将它们并列，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在实际的批评研究过程中却扬历史真实而抑艺术真实，并将前者作为评价作品真实与优劣的前提和先决条件。这样的结果就使历史小说因失去作为艺术应有的蓬勃飞扬的创造性、想象力，变成了毫无美感的“历史读物”或“准历史读物”。真则真矣，但却不美，也很难吸引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将历史小说创作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历史艺术化的活动”，因为在这样一个概念内涵中，艺术及其艺术真实并没有真正的地位，它充其量只是充当历史及历史真实转换的技术性的工具；其创作的主体和核心还是历史及历史真实，艺术及艺术真实是次要的。古往

今来大量事实表明:只有历史真实而没有或缺少艺术真实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对艺术真实的忽视,对历史小说来说是致命的;它所获得的真实层次、规格和内涵也是非常有限的。

如何协调和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让它们彼此都向对方敞开,通过对话、交流、碰撞而产生 $1+1>2$ 的效果,使之既具有充盈的历史质感又有丰沛的审美价值,形成一种为别的小说所没有的、极富张力的独特内涵,这是历史小说创作和研究的难点,也是关乎当下及未来历史小说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在这里,像以往的大量评论研究文章一样,停留在一般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比例(如所谓的“七实三虚”、“三实七虚”等等)是不够的,也没多大实质性的意思。关键是要联系现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实际,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很好地予以总结。而恰恰在这方面,《李自成》也为我们做了不少的探索。它的“深入历史而又跳出历史”,既重历史细节、历史细部又重历史本质、历史走势,以及高度重视形象塑造和情感抒写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我们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当然不必讳言,也留下一些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总之,对于姚雪垠这样一位在历史小说领域做出贡献的老作家,对于《李自成》这样一部推动了当代历史小说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作品,我们应该持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既不能因它的成就而否定它的问题,也不能因它的问题而抹煞它的成就,一切要“还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捧杀或骂杀,均不足取。

回顾《李自成》评论和研究的历程,不禁令人感慨万端。

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学界保持多年的沉寂,到1977至1985年间炙手可热,迅速升温,攀至顶峰;在历经近十年的高温期后,自1986年开始,评论热情渐次回落,九十年代之后骤冷直至当下,《李自成》似乎已鲜有人问津。像这样大起大落,当代文学中似不多见。如果说顶峰期给予《李自成》的鲜花与掌声主要是意识形态作用的非正常之果,那么由热突冷的评价态势难道就属正常、是一种严谨负责的学术态度?由《李自成》推衍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二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及五十年代的体制化文学,这一系列文学的评价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而这种评价,究其实质,即如何看待这些曾在文学史上扮演叱咤风云主角的主流文学,如何看待研究理论标尺随时代发展挪移到“去政治”一端后的原有历史小说创作等问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个老话题,迄今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新的进展,简单化的排贬逐渐失去市场。这是一种好的趋向,它预示着批评的理性和成熟。政治原本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参与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打造的全过程,渗透到历史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往往起始更迭都离不开政治,甚至是政治强烈介入的结果。离开了政治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这话绝非夸张,它从一个角度道出了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中国特色”。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历史政治化叙述有两重性:一方面政治被引进历史而成为作品艺术结构的哲学基础,它赋予历史以高山峻岭、水流湍急的阳刚之美,并将其由平面推向纵深;但另一方面也因单纯了人物线条、浅化了社会观察而将历史

原有的无限的丰富性过滤简化了。这样的两重性在《李自成》中也同时存在。

在小说中,当作者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学说引进到历史叙事之后,我们看到,它无疑使《李自成》中纷繁复杂的内容因此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贯穿始终的主脉,全书近三百个人物,明、清等几个朝代犬牙交错的历史生活能逻辑有序得以展示,整部作品拥有了大气、宏阔的史诗品格。阶级斗争理念下对李自成、高桂英等农民军将领的简化纯化,体现着政治人情主导的浅俗之美,沿承的是“明朗的天”式的美学观;不过这种美学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它有时在文本中也交叉穿插着与此不同的美学风格,即从人性悲剧、命运抗争等层面展开的生命哲学思考。这突出表现在崇祯、杨嗣昌、洪承畴等反面形象的塑造上。并且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后一种美学风格逐渐扩张,已铺及李自成、李岩等正面人物形象。这就使全书的美学观因两种美学风格的碰撞、冲突、交融、杂汇而形成奇妙的矛盾统一体:朗悦与深郁拼接,平面与立体交互。套用雷达评《艳阳天》的一句话,就是它“既真切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称得上“是个奇妙的混合体”。^①

是否可以这样说,姚雪垠最初是抱持批判封建帝王将相而为农民革命立传的明确思想从事《李自成》创作的;但当他一俟进入文本,面对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主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就身不由己地对原有理念做了富有意味的调整和超越。崇祯被动卷入战争的无奈,对情感、生活和生命的渴

① 雷达《旧轨与新迹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望,以及与灾难的顽强抗争和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等,这一切读来都使人唏嘘不已。正由于作者将崇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政治理念中的封建阶级头子来描绘把握,他的创作动机与文本实践才会产生了如上的“错位”,而使崇祯形象得到如此复杂立体多面的生动呈现。姚雪垠与《李自成》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他推崇阶级论,抱着“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①的目标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尊重历史与艺术,在“对历史事实进行严肃、认真、细致、全面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我)自己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要求”。^②当他笔下的人物真正“活起来”之后,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就超越了阶级论的局限,而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

要而言之,尽管从全书的整体来看,由于作者身体和观念方面等因素,《李自成》后两卷较之前三卷,在艺术质量方面有所下滑;但就总体而言,堪称是二十世纪历史小说的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具有其他作品所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尤其是崇祯“这一个”亡国之君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他对当代历史文学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而且对于新时期以来频繁进行观念试验,却难以树立真实深刻人物形象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姚雪垠良好的文史功底,对待历史的严谨认真,书写文本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大气、开阔的美学风格,

①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前言》,《李自成》第一卷(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② 姚雪垠《〈李自成〉创作余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也都是当下历史小说值得师法的地方。杨义在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探索者小说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近十年为数繁多的探索者小说,是缺乏姚雪垠描写明清之交社会政治军事风云那种史诗气魄的,……而缺乏这种史诗气魄和从容风度的作品,不管它如何风行一时,它传世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总是有所亏欠的。”^①的确,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确实需要能与之相应的历史小说出现,将整个文学史撑起来。从此而言,《李自成》选择的不同于《大波》的另一种历史叙事,其文学史意义和价值都不可低估。

詹玲于2005年由杭师院来浙大读博,三年后,她按时毕业,回到母校中文系从教。她原本不是文学科班出身,自考拿到本科文凭,硕士学的又是教育学;接受正规文学教育和学术训练,严格地讲是从来浙大开始的。詹玲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以为主要是勤奋和悟性这样两条。《李自成》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选题,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到很多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知识,选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思想内容上看,《李自成》以阶级论作为历史叙事的哲学基础,属于革命红色经典写作,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实属不易。也许这个缘故吧,不少研究者对此望而却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詹玲选择《李自成》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委实有些大胆。当然,我最欣赏的还是她以后在论文中所表现出的不为时尚流行所动的执着和自信:面对《李自成》这部毁誉莫辨、融涵了当代太多争议的长篇巨著,她既不人为地加以拔高和夸饰,也不有意进行打

① 杨义《当代小说的风度与发展前景——与当代小说家一次冒昧的对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压和贬斥；既对创作主体和主要方面进行充分的、富有深度的分析，也注意到其中潜存的自我矛盾和冲突；并将这一切纳入学术的话语体系中进行实事求是的学理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很难得的。需要指出，詹玲在确定该选题之前，已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水平不错的文章。特别是2006年4月，在我们浙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文学评论》共同举办的“文化生态环境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她提交的一篇有关小说《刘志丹》研究的会议论文，被《文学评论》看中并发表，显示了较强的研究水平和潜力。这也是我最终为她确定这一选题，并放心和放手让她撰写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詹玲还很年轻，今后的道路还很长。她勤勉刻苦，聪慧好学，富有灵性，又有一个很好的学术起点。顺此以往，相信将来在学业上必将有所作为矣。此次她的博士论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昔日的指导老师，我自然感到十分欣慰。现遵嘱写下如上文字，既向她表示祝贺，同时也借此借题发挥，表达我对历史小说研究的一些想法。希望得到有关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

2009年7月5日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吴 秀 明 1
绪论 在历史的向度里	1
第一节 现代历史小说发展： 从“为人”到“为阶级”	1
第二节 文学书写中的农民军队形象转变： 从“群盗”到“英雄”	8
第三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视野中的《李自成》	20
第一章 深入现实的历史之思	31
第一节 被规训的“古为今用”	32
第二节 阶级斗争的警示模板	49
第三节 被弃置的革命信仰	64
第二章 历史观：推动历史的“动力”与“合力”	78
第一节 “动力”与“合力”：冲突如何调和？	78
第二节 “动力说”下的二元对立	84
第三节 在阶级与政治之外	97

第四节 个案分析:李自成的革命性与人性	111
第三章 悲剧观:穿透历史与时代的精神传达	125
第一节 社会历史与阶级原罪下的悲剧必然	125
第二节 权力法则中的人性异化	142
第三节 现代性观照下的典型人物悲剧	158
第四章 文体观:叙述历史的整体与碎片	179
第一节 阶级斗争的史诗篇章	179
第二节 史重于诗的整体构架	195
第三节 历史碎影里的日常人生	208
余论 《李自成》之后的历史小说	228
第一节 模仿热下的缺失与新景观的建立	228
第二节 消费时代的历史之失	234
主要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48

绪论 在历史的向度里

第一节 现代历史小说发展： 从“为人”到“为阶级”

掌控历史的书写,不仅是思想与文化权力争夺的一部分,同时还因历史叙述与政权统治的微妙关系,成为政治权力纷争的纠结点之一。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深谙此道,并通过修著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等卷帙浩繁的官方史学典籍以确立本阶级话语,体现统治阶级的权威及意志。然而,自汉以来的儒学传统决定了思想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二元分化局面的形成和延续。数千年来,知识分子一直以思想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并形成了其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品格,即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政治社会秩序的维护与重建的“道”之责任。他们不仅干预时政,以“士志于道”的精神力谏君主,还以独立于皇权之外的“道”之品格审察历史,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文化视角书写历史。在纯历史学术著作与历史文学作品这两种历史书写形态中,后者,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小说,尽管未曾摆脱史传的依附地位,但由于其书写方式

灵活，既可忠实于史料，将历史通俗化，又可“只取一点因由”，加以渲染成文，因而给作者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文学性的介入使得历史传播的普泛性与有效性大为增强。因此，历史小说所拥有的历史话语权力，实质上远远大于位居庙堂之上的史书典籍。面对历史小说中与政权不合，甚至相背离的思想，皇权统治者所能做的，只有毁与禁，却无法从根本上夺取历史小说的书写权力。而在毁禁之后，被封杀的小说不但未曾就此绝迹，反而在数代之后流传得更广，再一次证明了政权压制下的徒劳。

知识分子领导思想与文化权力的地位，一直沿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大量新思潮的涌入，带来的是维护、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途径、方法，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用，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化与政治领导权的分野局面。因而，我们看到，时至三十年代末，知识分子始终都以相当自由的姿态进行文化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或对抗。自1902年《新小说》报社征稿时正式使用“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概念起，历史小说开始以真正独立于演义正史的姿态登上文学舞台，从思想到文字都拥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历史小说在各派文学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字风格与精神风貌。有像李劫人那样取当下时事为史，繁衍铺陈为长篇“大河”，更多的是对历史故事进行改编的短篇小制。而同是改写历史故事，它可以在鲁迅的笔下成为解剖中国文化、批判国民性的利器，也可以在郁达夫的文变成个人苦闷、忧郁情感的发泄地；它可以被施蛰存当作弗洛伊德精神心理分析学的试验场，也可以被茅盾改写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对立的水火之争。受时